



明代白玉透雕瑞兽玉带。

玉带饰：大有乾坤的腰间“奢侈品”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除了追求服装的精美，古人在服装的配件上也颇为讲究。譬如带饰，就是伴随中国古代服饰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腰部配饰。先秦时期，人们在穿上衣下裳式的礼服时，会在腰间由里而外系一条革带和一条大带，大带一般用丝织物制成，主要起到装饰作用，而革带以皮革制成，既可束腰，也方便佩戴蔽膝、珮、绶、剑等物件。带饰则可以对腰间的革带加以束缚，既是实用器，又是装饰品。唐代以后，带饰逐渐成为一种与身份地位有关的象征物。带饰的材质有金、银、玉等，其中尤以玉带饰最为珍贵且等级最高。玉带饰主要包括玉带钩、玉带扣和玉带三个大类。明代是玉带饰发展的鼎盛时期，一个人佩戴的玉带饰能够彰显他的地位和财力，是其社会身份的重要标识物，可谓大有乾坤。

带钩古称“犀比”，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用来系腰带的挂钩，一般由钩首、钩颈、钩体、钩面、钩尾、钩柱、钩钮等组成，其一端曲首，皆有圆钮。有一段知名的历史故事就与带钩相关：春秋时期，齐襄公死后，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相回国，抢夺国君之位。管仲为了帮助公子纠夺取王位，便在公子小白返回齐都时试图刺杀他。射出的箭刚好落在了公子小白腰间的带钩上，小白装死，待管仲离开后又火速上路，赶在公子纠之前坐上王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可以说，小小的带钩拯救了一位未来春秋霸主的性命，也间接影响了齐国乃至整个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

至于玉带钩，其实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整体以修整好的长方形玉块钻琢琢磨而成，是古代玉带钩制作的初始状态。至春秋战国，玉带钩进入发展期，西汉发展到高潮，到东汉开始衰弱，元明清则进入回升期。



明代绞丝纹玉带扣。

明代玉带钩造型丰富多变，有板形、桥形、琵琶形等。其中以龙首螭身玉带钩为典型样式，属于明代玉带钩中的精品。这种龙首螭身带钩旧称“苍龙教子”，主要流行于明代早中期，带钩呈琵琶状，钩身上方镂空雕刻一条匍匐爬行的螭螭，与钩首的龙头相呼应，刻画逼真、栩栩如生。

带扣大约出现在春秋晚期。在北方草原地区，带扣一开始便用于服饰束带；中原地区的带扣则是从马具开始的，大约到西汉时期才开始作为服饰束带。到两晋时期，带扣的使用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不同规格、不同质料的带扣分别为不同阶层的人所用。南北朝时期，带扣还被用于武士披甲挂铠，并因其实用优势逐渐取代了带钩。

带扣一般由两件大小相近、形状相似的玉件配套组合使用，钩首与扣环相扣。明代玉质带扣被广泛用于服饰束带，表明不同的身份与地位。明代玉带扣多采用镂雕工艺，制作精美，种类丰富，纹饰多样，常见螭纹。明鲁荒王墓出土的洪武时期的青玉带扣，其形状已与现代的黑皮扣基本一致。明代带扣的材质也不只限于玉石，镶宝石

金带扣在当时的藩王墓中多有发现。

带钩、带扣可以单独用来束缚革带，玉带则通常是指用玉装饰的革带，属于一种组合式的带饰。一条完整的玉带一般由带扣、带銙、带尾三部分组合而成，其中，带銙俗称“玉带板”，是钉缀在革带上的片状牌饰。玉带板的形状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心形、银锭形、连珠形、如意形等；外表又分光素面和带纹饰两种，纹饰大部分为浅浮雕鸟兽、行龙、乐伎、花卉等。带尾也称“辮尾”，除了装饰外，还起到保护皮革的作用。

玉带最早出现于北朝，《周书·李迁哲传》记载：“军还，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带及所乘车马以赐之。”就目

形成定制，十分严格。《明史·舆服三》载：“文武官常服，洪武详定。凡常朝视者，以乌纱帽、圆领衫、束带为公服。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钹花，四品素金……”玉带在当时属于皇亲贵族、高阶官员佩戴的腰间“奢侈品”，而玉带上带板的数量也因人而异，带板的质地、用数、纹饰可用来区别身份高低、官阶高下。因明代玉带上镶嵌的带板的数量较多、尺寸较大，超过腰围很多，因此玉带一般是悬挂于腰间，即虚悬于腰部而非束扎起来。

我国各地明墓出土的玉带板非常多。明代玉材来源扩大，玉雕市场活跃繁荣，玉带板雕琢水平也很高，多采用透雕或高浮雕技法制成，纹饰为各种吉祥瑞兽、花鸟人物。但其在琢制过程中，不太注重细部的打磨，因此有“粗大明”的说法。明代早期，玉带板的雕刻留有明显的元代风格，采用立体深层镂空雕刻技法，以云龙纹为主；明代中期，寓意吉祥的图案流行，多采用分层镂雕技法，先用减地法雕出上层图案，后在降低的地子上镂雕出底层图案；明代晚期，玉带板的雕琢呈现粗犷简略的风格，与早期风格有所不同，图案设计更为灵活多变。



明代螭螭纹玉带扣。

前考古资料所知，最早的玉带出土于陕西咸阳北周若干云墓。作为古代官场礼服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带的制作和使用不断被规范化。唐代对饰玉的形制、用数均有明确规定，如《唐实录》载：“文武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三銙；四品金带十一銙，五品十銙；六品以犀带，九銙；七品银带；八品、九品鎗石并八銙；庶人六銙、铜铁带。”

明代，玉带的使用极为盛行，且已



▲明洪武青玉带扣。

▲明代白玉龙首螭螭纹带钩。

（据《中国文化报》）

清代田黄石雕



该田黄石雕长约9.7厘米，其石质细腻如同凝脂，十分养眼。

据介绍，该田黄石雕正面以薄意技法浮雕人物、小桥、亭台、楼阁。背面则雕刻两个高士立于城楼之上，凭栏远眺，洒脱飘逸，刻工古朴精湛。（据《侨乡科技报》）

金嵌珠宝圆花



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枚清代金嵌珠宝圆花，直径7厘米，金质底托上镶嵌珠宝。中心为一颗大块的祖母绿宝石，外围嵌两圈小颗的祖母绿与红宝石，每圈各15粒，宝石皆随形。最外嵌一圈珍珠，共16粒，且外围皆有可系缀的套环。

圆花中心及外圈宝石中所选用的祖母绿宝石晶莹剔透，碧如新柳，肉眼可见祖母绿宝石内部天然生成的包裹体，这些俗称“蝉翼”的绵絮纹等天然杂质是其他宝石所少有的，也为鉴别其真伪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据《人民政协报》）

王雪涛画作寓意“冠上加冠”

画面描绘嫣红色的鸡冠花下，雄鸡红冠黑羽，步伐矫健。

据介绍，此画为著名画家王雪涛所作，寓意“冠上加冠”，象征着官运亨通。其画静中有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据《侨乡科技报》）



江豚形陶壶



在南京博物院长期展出的文物中，江豚形陶壶是最为吸睛的藏品之一。陶壶整体高11.7厘米、长32.4厘米，泥质灰陶。江豚体态肥硕，头部有圆雕尖嘴，阴刻圆眼中竖线为睛，被认为是模仿长江中的白鳍豚而塑造的。陶壶整体如梭形，尾部开有圆形口，并向上翘起，腹部中空，可储水。从形态上看，工匠是抓住江豚在水中游动摆尾的那一瞬间加以形象表现，十分生动。江豚是没有足的，为了稳定陶壶，工匠选择在豚腹用三扁足支撑，极富动态美，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公开资料显示，这件陶壶1960年出土于吴江梅堰遗址。梅堰遗址属良渚文化，距今有4000多年历史。在该遗址，考古专家们发现了石、玉、骨、角、蚌等器物共122件，采集到各类遗物4000余件。与其他出土文物相比，江豚形陶壶较为特殊，因为前有尖嘴，头顶还似是有冠，与鸟形相类，所以在发掘出土后曾被短暂地称为鸟形壶，但在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的帮助下，最后正名为“豚”。这是迄今所见唯一一件良渚文化似江豚形陶壶。（据《扬子晚报》）

品赏明代御瓷中的祥禽瑞兽

日前，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御瓷凝瑞——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吉祥动物纹瓷特展”亮相恭王府博物馆乐道堂展厅。展览围绕恭王府“福”文化内涵策划，展出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明代瓷器中以吉祥动物纹为装饰题材的器物120件。展品中不仅有宣德青花蟋蟀罐、成化天字罐等明代御窑珍品，还有多件无同类传世品的瓷器修复件，如造型奇特的成化青花凤穿花纹鹤颈瓶、目前所见永乐朝御窑瓷器中器身最高的甜白釉盘口兽耳长颈瓶、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官方IP形象的原型——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等。

景德镇御窑厂是明清两代官方设立的御用瓷器专门生产机构，自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至清代宣统朝止，500多年间烧造出难以计数的佳品。为保证产品质量，御窑厂实行严格的拣选制度，瑕疵品被就地砸碎、掩埋。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在御窑厂遗址发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瓷器残片，并修复出1000多件明代御窑瓷器。这些碎瓷片和修复件为

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现存器物所不具备的信息，拓展了人们对陶瓷品类的认知。

明清景德镇御窑瓷器多以吉祥纹样为装饰，体现了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和生活美学思想。展览中可以欣赏到各类吉祥动物纹，除了常见的龙纹、凤纹，还有很多祥禽瑞兽、神话动物形象，或威猛、或灵动、或呆萌可爱，寄托着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

位于展厅中央的宣德青花鹦鹉折枝花果纹盘，直径达72.3厘米，是少见的御窑出品大器。盘心绘鹦鹉啄桃图，画意取自唐代诗人杜甫《山寺》诗中的“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象征着自在安乐的生活状态。鹦鹉音同“英武”，被古人视为瑞鸟，广受喜爱。配合此件瓷盘，展出了恭王府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道光年间绿釉鹦鹉一对，造型逼真，釉色鲜丽。

展览中还设置了触摸明代御瓷的体验环节，供观众触摸的瓷片来自明代正统年间未烧成的青花龙纹大缸，距今近580年历史。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3月30日。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